

论中亚的伊斯兰化

蓝 琪

内容提要：公元 11 至 13 世纪上半叶是中亚伊斯兰化时期。7~8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中亚西部呼罗珊和中亚腹地河中地区；10~11 世纪，在喀喇汗和伽色尼两个王朝的推动下伊斯兰教向东、向南传播，今中国新疆西部、阿富汗中部和印度河流域的居民陆续皈依了伊斯兰教；11~13 世纪，伊斯兰教深入到中亚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中亚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本文从物质文化、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剖析了伊斯兰教对中亚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中亚 伊斯兰化 喀喇汗王朝 伽色尼王朝 阿拉伯

中图分类号：B96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1）04—0001—07

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一书中写道“在正统的哈里发时代，基本上完成了所谓‘穆斯林的征服’……。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征服了波斯、肥沃的新月和北非洲。在阿拔斯人统治的第一个世纪，征服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伊斯兰教胜利的阶段。”^① 伊斯兰教在中亚取得胜利（即使非伊斯兰地区归附于伊斯兰教政权和使非伊斯兰地区居民改信伊斯兰教）是阿拔斯王朝时期，即征服运动的第二阶段。8 世纪中叶至 9 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在中亚西部呼罗珊地区获得胜利；9 世纪中叶以后，即萨曼王朝统治时期，河中地区的大多数居民接受了伊斯兰教。以后，伊斯兰教深入发展和广泛传播的任务落到了中亚地区三个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喀喇汗王朝、伽色尼王朝、塞尔柱王朝）的肩上。

10 世纪，萨曼王朝的波斯人将伊斯兰教推进到锡尔河中游东岸的一些城市和萨曼王朝东北边境的一些部落（如葛逻禄人），但直到 10 世纪初期，楚河流域、七河流域和伊犁河流域的大部分居民和部落仍未接受伊斯兰教。这些地区接受伊斯兰教是在 10 世纪末期至 11 世纪，即喀喇汗王朝统治时期。11 世纪初，在喀喇汗王朝武力的推进下，伊斯兰教东传至于阗，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向东北传到了天山南麓的阿克苏、库车等地。12 世纪，天山南部，库车以西地区的居民基本上皈依了伊斯兰教。13 世纪，伊斯兰教传播到天山东北，以今吉木萨尔县为分水岭，其东为佛教势力，其西为伊斯兰教势力。伊斯兰教在中亚东部的胜利应归功于喀喇汗王朝。

伊斯兰教在阿富汗斯坦获得胜利的时间是 10 世纪中叶以后，即伽色尼王朝统治时期。阿拉伯人对阿富汗的征服战争开始于 7 世纪中叶，650~651 年间攻下喀布尔。705~715 年，呼罗珊

^① [美] 希提著；马坚译 《阿拉伯通史》（上），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422 页。

总督屈底波的军队先后占领了赫拉特、喀布尔、哥疾宁等城。阿拉伯人在这些城市摧毁佛寺,迫使一部分市民改信伊斯兰教。在此时期内,阿富汗的一些中心城市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其余大多数地区仍然是非伊斯兰教地区。10世纪中叶,阿尔普特勤率军南下,以哥疾宁城为都建立了以伊斯兰教逊尼派为国教的伽色尼王朝。在该王朝的大力推进下,伊斯兰教在阿富汗取得了胜利。

伊斯兰教向北印度的传播也是由伽色尼王朝完成的。7世纪末,阿拉伯军队在征服呼罗珊和河中地区之时,曾逼近北印度边缘。8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占领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和旁遮普北部地区,征服木尔坦,将其纳入伊拉克总督辖区,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印度西北部。但是,该地区的大多数居民并未改信伊斯兰教。10世纪下半叶,伽色尼王朝发动“圣战”,征服信德地区,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操突厥语民众、阿富汗人迁入印度定居,与当地居民融合,伊斯兰教在印度有了根基。一个多世纪以后,一些原来信仰印度教的封建主改信了伊斯兰教。12世纪中叶,阿富汗古尔人夺取印度西北部地区,继续向朱穆拉河和恒河流域扩张,伊斯兰教也随之传播到这些地区。13世纪初,印度德里素丹国(1206~1526年)大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居民改信伊斯兰教。在北印度伊斯兰教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伽色尼王朝、古尔王朝和以后的德里素丹王朝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伊斯兰教向西传到小亚细亚的过程中,塞尔柱人起到了重要作用。11世纪中叶以后,在伊斯法罕建立政权的塞尔柱帝国夺取了小亚细亚的一些城市,但他们未能在此立足。1071年,塞尔柱帝国与拜占廷帝国为争夺小亚细亚发生战争,在战争中,拜占廷皇帝罗曼努斯受伤被俘,拜占廷战败,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建立了政权。大批游牧民族涌入小亚细亚,改变了小亚细亚居民的宗教信仰,使小亚细亚最终纳入了伊斯兰世界。

10世纪中叶以后,伊斯兰教在向外传播的同时,在中亚地区向纵深发展。两百多年以后(13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中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渗透到中亚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中亚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方式。中亚居民的伊斯兰化在物质文化、制度、意识形态诸方面呈现出来。

喀喇汗王朝统治的河中地区和锡尔河以东地区,伊斯兰文化对这些地区居民的饮食、服饰、婚嫁习俗产生了极大影响。在饮食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恪守《古兰经》对饮食的有关规定,禁食猪肉、驴肉、马肉和狗肉,自死的牲畜一律不吃,牛羊肉均由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宰杀等等。在服饰方面,男人戴小花帽,妇女围头巾,这是伊斯兰教服式,伊斯兰教认为,在室外,头部不加任何遮盖是对上天的一种亵渎。为保持清真寺的神圣和洁净,穆斯林在鞋外还要穿上套鞋,在入殿之时只需脱去套鞋,既方便又干净。穆斯林喜爱棉布,他们衣服的原料主要是棉布,布料和服装的装饰采用植物的枝、叶、蔓、果及几何图形,严禁偶像崇拜。

中亚居民遵守伊斯兰教的一些宗教习俗,如定时礼拜、净身、割礼、葬礼。以往中亚居民死后的埋葬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以祆教实行的火葬盛行。接受伊斯兰教以后,中亚居民的葬俗按伊斯兰教教规实行土葬,尸体洗净后裹以白布,放入墓坑中,脸朝圣城麦加的方向。接受伊斯兰教以后,中亚居民开始过如开斋等阿拉伯人的节日。11世纪,伊斯兰历在中亚东部居民中使用,在叶儿羌(今莎车)出土了这一时期的法律文书,他们使用了伊斯兰历。^①

① 莎车文书中如,474年 Du'i-Higga月1日(即公元1082年5月1日)传唤证人到法庭。引自牛汝极《莎车出土的喀喇汗朝阿拉伯语法律文书与〈福乐智慧〉研究》,《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

在政权构建方面，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也遵照伊斯兰正统国家的模式。在中亚，这些王朝统治者承认阿拔斯哈里发的宗教首领地位，尊哈里发为最高宗教统帅。伽色尼王朝和塞尔柱王朝的铸币上出现了哈里发的名字（al - Mustazhir）。中亚统治者以获取哈里发授予的称号为荣，据《治国策》记载，伽色尼素丹马赫穆德随着他征服地区的增多，曾要求哈里发授予他更多的头衔，他送了十多次申请都没有结果，最后采取了一些卑鄙的手段。^① 在莎车发现的文书中，喀喇汗王朝的汗都带有一系列伊斯兰教式的尊号。

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对外扩张也采取伊斯兰政权惯用的方式，即对异教或异端发起圣战。喀喇汗王朝、伽色尼王朝、塞尔柱王朝在扩张领土之时打着圣战的旗号。据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文献反映，喀喇汗王朝穆萨汗在 960 年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后，从 961 年至 1006 年间，向于阗发动了多次“圣战”，但从宋朝的历史记载和敦煌发现的于阗文文书来看，双方的战争纯粹是政治和军事上的争夺，与宗教无关。^② 伽色尼王朝统治者对印度的征服也打着圣战的旗号，实际上，他们发动的战争大多数是为了掳掠印度的财富。塞尔柱人在征服西波斯和两河流域之时，也打着伊斯兰教正统派的旗号，打击伊斯兰教什叶派政权布威希王朝，他们拥护逊尼派的口号赢得了哈里发的支持。此后，在阿姆河下游兴起的花刺子模帝国也在圣战的名义下扩张，摩诃末声称要把穆斯林从异教徒（即西辽契丹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210 年的塔刺思之战给他带来了声誉。

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的统治也采取伊斯兰政权模式，他们在形式上以伊斯兰教治理国家和规范社会秩序。莎车出土的一件处理土地纠纷案的法律文书反映，文书行文按伊斯兰教规定的固定式样书写：文书开头是赞颂安拉：我赞颂独一无二的安拉（bismi - alla al - rahman - i al - rahim）；正文第一行：以宽厚、仁慈的安拉的名义；第二行：哈孜（伊斯兰教法官）和伊玛目阿布·巴克尔·穆哈迈德（Abu Bakr Muhammad）——愿真主保佑并庇护他——（裁定）的文书。在文书中，凡提到喀喇汗之名，以及在第一次提到证明人之名时，都要乞求安拉保佑他们。在行文及结尾判决部分一段出现“向至高无上的真主乞求帮助”的话语。^③ 行文用语为阿拉伯语。

在经济制度方面，这些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伊斯兰化倾向也十分明显。萨曼王朝时期，呼罗珊实行伊斯兰教的分封土地制度，即伊克塔土地制，河中地区的农业区域也有赏赐“份地”（伊克塔）。到了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时期，伊克塔制度得到了广泛推行。在此期间，采邑制成为中亚占优势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它遵循着与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伊斯兰世界基本上一致的发展道路。最初，伊克塔“份地”及其土地上耕种的农民，都由国家支配，土地不是受封者的私人财产，受封者不能干涉农民的生活，并且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的贡赋，此外还要按照王朝统治者的要求，率领自带装备的武装部队去为王朝统治者效劳。从 11 世纪后期起，特别是在 12 世纪，大部分封建主的领地变成世袭领地，在其上耕作的农民也逐渐处于完全依附于封建主的地位。

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以伊斯兰教教派斗争的形式出现。在它们统治

① 〔波斯〕尼扎姆·莫尔克，〔英〕胡伯特·达克著；蓝琪，许序雅译 《治国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49～157 页。

② 钱伯泉 《大石国史研究——喀喇汗王朝前期史探微》，《西域研究》2004 年第 4 期。

③ 该文书的全部内容见牛汝极 《莎车出土的喀喇汗朝阿拉伯语法律文书与〈福乐智慧〉研究》，《西域研究》1999 年第 3 期。

时期，中亚各地几乎都存在着一支以伊斯兰教事业为生的宗教队伍，其中上层分子拥有包括耕地、房产、商店、作坊、旅店等在内的大量“瓦克夫”财产，依仗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与世俗封建主的代表——王权争夺权力。在这一斗争中，统治集团有时候寻求与他们的结合，有时候又以异端为由打击宗教势力。在很长时间内，教权占据上风，宗教界以异端信仰为由处死的西喀喇汗不止一个。

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胜利，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这些王朝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采取了伊斯兰教派别斗争的形式。中亚居民改信伊斯兰教以后，统治者利用伊斯兰教指导和束缚被统治者的思想和行动；宗教界上层利用伊斯兰教剥削普通穆斯林。穆斯林反对统治者的斗争往往采取伊斯兰教异端（如伊斯玛仪派、卡尔马特派）的形式出现。代表被压迫人民特别是手工业者利益的伊斯玛仪教派在呼罗珊的活动频繁，该派主张财产共有、社会平等。教徒们在伊拉克南部库法附近举行武装起义，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起义势力迅速扩张到呼罗珊和河中地区。

中亚伊斯兰化在文化方面的改变首先是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的使用。在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统治期间，尽管他们的语言普遍流行，但由于诵读《古兰经》、礼拜、传教等宗教活动的需要，中亚居民开始接触和学习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著作者也开始用阿拉伯文写作，以获得更多的读者。于是，在中亚学习和掌握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的人在逐渐增加。10世纪以后，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本族语言的现象出现，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语言有：呼罗珊和塔吉克斯坦使用的波斯语，河中地区和中亚东部使用的突厥语，阿富汗斯坦使用的普什图语，北印度使用的乌尔都语。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本民族语言在喀喇汗王朝统治的中亚东部表现最为明显，此前，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的文字繁杂，有婆罗迷文、粟特文、藏文、汉文，以及当时高昌回鹘人创造的回鹘文，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文字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尽管到13世纪，阿拉伯文字还没有能够成为喀喇汗王朝使用的唯一文字，但阿拉伯文已经普遍使用，这种情况从铸币和法律文书中可以反映出来。在10~13世纪初的喀喇汗王朝钱币上铸有阿拉伯文铭文，它与西亚、中亚其他地区的各种阿拉伯文钱币同属于伊斯兰文化系统。1992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出土的西辽古币，也铸有阿拉伯字体样花纹。在莎车出土的法律文书中，大多数采用阿拉伯文签名。

10世纪以后，中亚文学和艺术从形式到内容都打上了伊斯兰文化的烙印。著作者把模仿阿拉伯伊斯兰诗歌流行的模式视为一种时髦。他们以对真主、先知、四位圣门弟子及王朝统治者的赞颂开篇，然后才进入对故事情节的描绘和对伦理问题的论述。1069年在喀喇汗王朝文化中心喀什噶尔写成的《福乐智慧》就是按照穆斯林著作程式写成的，它采用了阿拉伯诗歌中的阿鲁孜韵律，这种韵律于9世纪初传到了呼罗珊。1072年，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巴格达用阿拉伯文写成《突厥语大词典》，也模仿了阿拉伯词典的编纂方法，以阿拉伯字母拼写词条并释义。这两个事例充分反映了中亚文学方面的伊斯兰化倾向。

中亚艺术的伊斯兰化倾向更加明显。由于建筑业的发展，实用艺术随之发展起来。建筑砖瓦、砌面陶板、雪花石膏雕刻等等装饰都采用具有伊斯兰特色的图案，即几何图、植物纹、鸟纹、花式题词。在这一时期的中亚建筑和用具上随处可见。从11世纪起，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城出现了典型的伊斯兰建筑形式，即复杂的多立柱式组合建筑，这类建筑的主体部分是：底部为方体，顶部为圆穹、圆拱，建筑物有尖拱或圆拱形式的正门，由于呼唤礼拜的需要，在主体建筑或大门的两侧建有邦克楼（又称宣礼塔），建筑物的外墙砖上刻有植物图案和花字题词。此外，

陵墓建筑也表现出伊斯兰风格，如桑扎尔素丹陵，陵墓为方型穹顶殿，殿外有回廊，殿内两壁设有壁龛。

中亚的伊斯兰化倾向还可以从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中反映出来。在思想上，中亚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利用伊斯兰教加强思想统治，注重以伊斯兰教教义统一人们的思想。公正、平等是伊斯兰教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古兰经》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提倡精诚团结，以缓和社会冲突，真主是团结一致的凝聚力量。“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3：103）^①喀喇汗王朝统治者利用“团结、友爱，穆斯林皆兄弟”的思想，以平息现实生活中人的不平等现象。一方面，他们宣扬作为真主的奴仆，人人都是平等的，君主与臣子之间、伯克与百姓之间应该建立友好、亲善和谐关系。伊斯兰教在集体礼拜时，穆斯林不论老少、贫富、种族和肤色，按到来的先后顺序排队，一齐礼拜，念清真主，这种祈祷显示了和谐友爱的兄弟般情义。另一方面，根据《古兰经》“行善和作恶的人都各有若干等级”，不同的等级和贵贱是命中注定的，统治者的权利是真主造人时赋予的。“他以你们为大地的代治者，并使你们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级。”（6：165）这些思想支持喀喇汗王朝和塞尔柱帝国在经济上实行的等级分封制。

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过程中，顺应、吸收和兼容了中亚的传统文化，形成了有别于阿拉伯文化的操突厥语诸族—伊斯兰文化。艾哈迈德·爱敏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说“这些人信奉伊斯兰教之后，纵然成为虔诚的笃信者，也不可能如阿拉伯人那样去理解伊斯兰教的内容。每一个民族之了解伊斯兰教，必定搀杂着本民族许多古代宗教的传统；每一个民族了解伊斯兰教的术语，必定模拟它，使它近似自己的宗教术语。”^②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统治时期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实际上是伊斯兰文化与操突厥语诸族文化相互渗透、整合的过程，经过对多元文化扬弃、纳新、吸收、发展，中亚地区最终形成的是一种以操突厥语诸族传统文化为特质、以伊斯兰教为表象的新文化体系。

与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文化不同，中亚的操突厥语诸族—伊斯兰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在政治体制上，中亚操突厥语诸族的三个王朝不同于一般伊斯兰国家的政教合一制。阿拉伯人的政教合一的内涵之一是国家领袖和宗教领袖的身份合一、政权与教权合一；而中亚操突厥语诸族王朝，“汗位”的继承不是依统治者在宗教界的地位，而是依汗室成员身份得以继承，尽管他们都强调汗王所具备的一切是真主赐予的。这三个王朝世袭王权的观念体现了伊斯兰文化与操突厥语诸族文化的相互融合。

其次，阿拉伯人的政教合一的内涵还包括国家法律制度和宗教法律制度合一、政府机构和宗教机构合一、政府行为和宗教行为合一，而操突厥语诸族王朝的司法权并不完全掌握在宗教界首领手中，尽管法官也称哈齐，但是，掌握司法权的大多数是部落首领，实施的法律也是按照符合当时部落生活习惯的习惯法。直到16世纪，哈萨克人的法律仍然以习惯法，而不是以伊斯兰教法治理社会。

在经济制度方面，喀喇汗王朝将伊克塔土地制度与以往的阿尔泰突厥政权的分封制度结合起来，王室成员把国家看成是他们整个民族的财产，各个成员都有分得一份的权利。喀喇汗王朝对

①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6页。

②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著；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2页。

它统治下的土地实行“份地”，这种“份地”名为“伊克塔”，是赏赐给王室成员和军事首领。^①大塞尔柱帝国也与喀喇汗王朝一样采取赏赐给王室成员和军事首领的伊克塔制度。

在信仰方面，伊斯兰教奉行严格的一神教义，反对除安拉之外的任何崇拜；而操突厥语各族的信仰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接受伊斯兰教的宗教观，承认神创说，另一方面，他们明显持万物有灵论，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动物崇拜）的观念长期保留下来，如祈雨，占卜、算卦、看相、念咒、跳神等习俗都是这一观念的反映。操突厥语诸族把这些信仰与对真主的信仰糅合在一起，萨满巫师在跳神之时，赞念真主和呼唤穆斯林圣贤。此外，他们还保持了祖先崇拜的习俗。伊斯兰教在应对以上问题时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的信仰与伊斯兰教习俗糅合在一起，陵墓（麻扎）崇拜便是这种糅合的体现。在麻扎朝拜的仪式中，朝拜者把三角旗绑在树枝上，插在麻扎周围，或在周围的小树、灌木上拴上各种颜色的布条，在高竿上挂牛尾、马尾及其他饰物，这些都是萨满教的做法。

伊斯兰教自公元8世纪传入中亚，至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中亚五国的穆斯林人口共约3257.45万，占总人口的69.8%。^②在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之前，原始宗教、祆教、摩尼教、佛教、景教都在中亚传播过，其中祆教、佛教在不同时期还占据过主导地位，但伊斯兰教最终在中亚地区取得了全面胜利，成为中亚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中亚伊斯兰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伊斯兰教在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其他宗教的教义和仪式。在伊斯兰教教义中，存在着与祆教、犹太教、基督教一致的观念，特别是与在中亚古代占主导地位的祆教。祆教认为，人死时灵魂离开肉体，三日之后由一女神接至“分别之桥”接受审判，即最后审判，审判后分别进入天堂和地狱。天堂和地狱的观念在祆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都存在着。每日五次祈祷、洁净习惯、赈济义务等伊斯兰教的礼拜仪式，有的也源于其他宗教，如祆教。教义和宗教行为的相似性使伊斯兰教容易被中亚居民接受。

2. 伊斯兰教具有包容性。伊斯兰文化在中亚与操突厥语诸族文化相互协调。在宣扬、评判道德伦理以及明辨是非等方面利用了原来的操突厥语诸族文化。如《福乐智慧》一书在强调伊斯兰思想观念“幸运无常”时，引用了古突厥人的名言：幸运之主啊，莫为幸运而得意，有声望者啊，切莫对幸运轻信。世间三物：流水、舌头和幸运，总是反复无常，流转不停。^③关于人性：有一句古突厥格言讲得真好，愿你记取它为座右铭：与娘奶一起注入的善性，直到死之前，不会变更。先天而生的天赋秉性，只有死亡能把它撼动。^④引用的古突厥格言贯穿全诗，反映了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继承。

3. 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过程中采取的方式也是它成功的重要原因。最初，阿拉伯人依靠了武力传播伊斯兰教，以军事上的胜利为推行伊斯兰教开辟道路。以后，喀喇汗王朝也使用武力强迫塔里木盆地南缘居民改信伊斯兰教。然而，武力绝不是伊斯兰教在中亚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随之而来的经济手段和文化影响才是伊斯兰教在中亚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① [苏] Б·Г·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 《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11页。

② 世界穆斯林人口：http://www.kyaz.com/readarticle/htm/81/2003_8_7_1522.html。

③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等译 《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92页。

④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等译 《福乐智慧》，第120页。

阿拉伯人在传播伊斯兰教之时，对异教徒课以重税，不堪忍受人头税重负的祆教、摩尼教教徒纷纷改信了伊斯兰教。屈底波宣布“谁来做星期五的礼拜，我就给谁两个第尔汗。”^①此外，阿拉伯统治者将大批阿拉伯籍手工业者迁往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定居，让他们住在当地人腾出的房间里，鼓励他们与当地妇女通婚。

先进的伊斯兰物质文化也是中亚居民接受伊斯兰教的重要原因，阿拉伯商人在伊斯兰教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巴托尔德认为“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领域中，伊斯兰世界在这个时代的文明民族里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游牧民常常急需取得文明国家的产品，特别是衣服……首先是纺织品。”^②随着商品的交换，游牧民熟悉了穆斯林的商品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开始接受伊斯兰文化各个层面的影响。

阿拉伯人以《古兰经》为依托在中亚推行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消除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交流的障碍，儿童在还不识字阶段就会用阿拉伯语祈祷、咏唱；中亚学者有的只会讲阿拉伯语，而不会说自己的母语。由于阿拉伯语言文字的推行，中亚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互相渗透。这些也是伊斯兰教在中亚得以立足的重要原因。

清真寺的修建和经学院的创办对宣传伊斯兰教教义也起着重要作用。从12世纪起，伊斯兰教的传教士们开始用突厥文书写简单易懂的宗教诗歌和短文传教，以强化他们的宗教感情。这些措施有力地推进了中亚伊斯兰化的进程。

阿拉伯人入侵中亚的时间只有几十年，然而，中亚伊斯兰化的过程却是漫长的。从10世纪中叶开始的伊斯兰化过程到13世纪初基本完成。尽管如此，这一过程仍然在继续着，即使是在接受伊斯兰教较早的河中地区，多元宗教信仰的局面还一直维持到15世纪初。1403年出使撒马尔罕城的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写道“撒马尔罕居民中，亦不乏操突厥语族人、阿拉伯人及波斯人等。这些人仍然各尊其教派。至于伊斯兰教以外之亚美尼亚人、希腊教徒、基督教之雅各布派、聂斯托里派，皆有。尚有信奉拜火教，而自称基督徒之印度人，亦所在多有。”^③

伊斯兰化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宗教的一致性，有利于促进各族之间的通婚，有利于多种文化的趋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使中亚居民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道德规范、共同的行为准则，加速了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为中亚古代民族发展为现代民族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陈霞

责任校对：李文博

① И. Джаббаров, Г. Дресвянская *Духи, святые, бог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елигии.* – Т.: узбекистан, 1992, с. 144.

② (俄) 威廉·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73页。

③ (西班牙) 克拉维约著；奥玛·李查英译，杨兆钧汉译 《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7页。

On the Islamization of Central Asia

Lan Qi (1)

Abstract: The ages from 11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3th century is the period of Islamization of Central Asia. From 7th century to 8th century , Islamism was introduced to the places of Khorasan in the western of Central Asia and Transoxiana in innermost Central Asia. From 10th century to 11th century , with the help of Karahan and Ghaznavid Kingdoms , Islamism spread southward and eastward , resulting in the converting to Islamism of the residents in western Xinjiang , China , central Afghanistan and along the Indus Valley. From 11th century to 13th century , Islamism had been in every aspect of Central Asian society , even becoming a lifestyle. On three aspects , i. e. , material culture , political system and ideology , this paper analyzed Islamic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Key words: Central Asia; Islamization; Karahan Kingdom; Ghaznavid Kingdom; Arab

A study on “Registered Residents” in the Han slips from Xuanquan Yuan Yansheng (8)
Tibetan military system towards the Western Regions after conquest Zhu Yuemei (18)

Abstract: After occupied south edge of the Tarim Basin , Tibetan faced different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new community life , which influenced seriously their military system. Historical texts and ancient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Dunhuang suggest that Tibetan military system in the Western Regions resulted from their military forces regionalization and collectivization gradually , on the basis of both their “three troops” and military tribal alliance which were set up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ibet foundation. It consisted of four routes Khroms , being parallel with Hexi , Guanlong , Chuankang and west Erhai military commands. The root organizations under Khrom adapted to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mode of traffic and oasis city securit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army was rationed by ways of soils distribution , property registration and unified grain offering , etc. and the bureaucracy and its functions were modified correspondingly.

Key words: Tang Dynasty; Tibet; Western Regions; military system; official system

Conflicts between Mongol’ s nomadic patrimonialism

and Han’ s centralism and its influence around Yuan Dynasty Gong Haifeng (27)

Abstract: Around Yuan Dynasty , there were severe conflicts between traditional Mongol “nomadic patrimonialism” and Han’ s “centralism”. Emperor and central government attempted to carry out centralism , while nomadic patrimonialism had already deeply rooted in all the Touxia’ s (kings , emperor’ s sons – in – law , merited officers , etc) mind. From Ogodei conquered Jin and Kublai established Yuan , until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 although Yuan government had adopted various measures , these conflicts still remained and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Yuan Dynasty , which is also the reason for the “the merger of Mongol and Han” in Yuan Dynasty.

Key words: Nomadic Patrimonialism; Centralism; “Wuhusi (a tax)”; Touxia; Darughachi; the merger of Mongol and Han

An analysis of the District – Village system

of Xinjiang under Governor Sheng Shicai Chen Yun Zhang Hao (36)

Abstract: Sheng Shicai carried out his administrative system , namely district and village system ,